

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。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……

耳熟能详的小诗,赤子情怀袒露,再没有比这更烫心、更朴素的炙热心语了。写诗人已驾鹤西去,但诗仍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。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在散文、评论和翻译方面的成就,这个在文学领域如鱼得水般畅游的多栖客,带给世人太多惊喜和感动,一如这本《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》,这个站在忘川彼岸遥望红尘的老人——余光中。

故乡是余光中诗心澎湃的魂,中国是他魂牵梦萦的根。对祖国的热爱,希望两岸统一的心愿,是余光中所有文学作品的宏大主题。爱国情怀在余光中的散文中呼之欲出,诸如《日不落家》一文中写“山是岛的贵族,正如树是山的华裔”,有意无意间,敏感的故园相思之念“啪”地罩住了游子的灵魂!待读到《山盟》中“希望有一天能把这几个小姐妹带回家去,带回他们真正的家”,心的一隅忽似中弹般窒息起来,这个嘉陵江畔是故乡的才子诗人想念故乡了。《乡愁》是余光中的成名作和代表作,这发乎于情、燃乎于心的性情之作,惹多少人心绪跌宕!

语言的唯美是余光中一直致力的方向。文中充溢着水到渠成的美感,用语平实,却不掩其深厚

的古文功底和横贯中西的博学,文如行云流水,读来让人惊艳动容。“长巷短巷,雨里风里,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”,“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,空竟在哪里呢”,“黄透的枫叶杂着赭尽的橡叶,一路艳烧到天边”,“而现在,我在此城早已由落脚变成了落户,而且在草根成性的南部落了草”……诗意盎然,唯美中透着男性思维的阳刚气。

全书架构安排上颇见用心,从轻浅入深邃,由儿女情长到家国情怀,逐渐升华,愈读愈认识到余光中人格的伟大和文笔的精湛。发力之作压轴于后,垫底的是文学七彩楼阁散发出来的“珠光宝气”,熠人双睛。有人说,余光中瘦弱的身体里有炽热的光,照亮了时代文学爱好者幽闭孤愤的心灵。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,他就写有一些与今天时势接轨的文章,他说,把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,交给那些文化掮客去决定,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此语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!

刚柔并济,咳唾成珠

——余光中《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》读后

曹 辉



《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》
余光中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

喻理寄情字里行间藏禅味,也是余光中为文的能耐。正话戏说,亦庄亦谐。《我是余光中的秘书》一文,提及文山会海之烦,用语诙谐;退休之后不再开会,真是一大解脱。读来想见当时余光中的得意和淘气,这也罢了,他竟还

写了题为“开你的大头会”的文章,“大好的日子,一大堆人被迫放下手头急事、要事、趣事,只为听三五个人逞其舌锋,真是集体浪费时间的最佳方式。”再如他说“其实演讲本身并不麻烦,三分学问靠七分口才”,大实话真够味;对自己将出版书籍的认真校对,折射了他为人处事的态度;《饶了我的耳朵吧,音乐》一文告诉我们,你所爱未必他人之所爱,各花入各眼;《西湾落日圆》中提及台湾清华,深意在于心中藏着对北京清华的惦念。

偶尔有种错觉,余光中散文某些方面和汪曾祺相似,待读到《关山如月》,又觉与刘白羽有些相似。记忆里,余光中所写散文,生活原滋原味浓一些,但生活的烟火味并未覆盖他的才华,像《失帽记》说“长寿的代价是沧桑”及对父亲的怀念,像《日不落家》中“所谓恩情,是爱加上辛苦再乘以时间”的精辟论断等,简直是人生经验的总结,读来颇生怅绪愁怀。余

光中游记的风格,走的是中国古人的路子,如《小石潭记》《醉翁亭记》,笔者以为他还还可写得再野一点、再无忌一点,可惜,他已离开。

人有特长,书有亮点。这本书的精彩在后两辑。余光中写文,以评论最隽永最有鞭挞现实的深度。辑五《朋友四型》一文写得酣畅淋漓,是他评论文的高峰,理性强但不说教,开阖有致,读罢除了让人心情愉悦,再就是感觉“春天所有的眼睛都亮了”。他以生花妙笔谈了述而不作、不述而作、述作俱胜的文学观点和看法。在《自豪与自幸》文中,他说每个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话,但至少该像童年,一语击中多少过来人的心啊!

余光中认为,评论家要有学问,要有见解,有识天才于未显的能耐和敢言直言的品格。书辑五中的《论二房东批评家》是书中最有看点的一篇,所言有斤两,不以华丽取胜,体现了男性思维的理性优势。

余光中的散文,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很深,小情小调写得温柔百转,家国情怀写得荡气回肠。书名《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》,说老虎也会有细嗅蔷薇之时,不外是说忙碌而远大的雄心也会被温柔和美丽折服。阖书轻叹,斯人虽去,一脉文心与天地同在,耿耿情怀与日月同辉!

晚清诗歌里的中国现代性

——评《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》

尧育飞

初次阅读郑珍(1806—1864)及贵州沙滩地区黎庶昌、莫友芝等人诗歌时,汉学家施吉瑞先生便被这些晚清诗人的“现代性”所震惊。这些诗人身处中国内陆,却迅速接受了西方的海洋文明及工业化的新世界,这促使施吉瑞进一步研究,其成果便是《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》。

郑珍,字子尹,贵州遵义人,举人,虽仅担任过荔波县训导的低级职务,但作为清代“宋诗派”健将,诗歌成绩突出。陈衍称其“……历前人所未历之境,状前人所难状之状,学杜韩而非模仿杜韩,则多读书故也,此可与知者道耳”,道出郑珍与前代诗人的迥异处,即开拓了新的境界。

《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》共分五部分,包括绪论、生平、思想和文学理论、主要风格和主题、作品注释。该书最大特色是始终将“中国现代性”作为观照的视角,通过剖析郑珍诗文,归纳其现代性。

在列举了郑珍的现代性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后,施吉瑞提出,郑珍的现代性积极方面“全部来自中国,没有西方文化的影响”,消极方面则在 1840 年以后显著增强。譬如郑珍对传统的质疑可能出自对科举考试的反思,也来源于乾嘉考据对经典的重估,但质疑之后却无传统之外的道路可走,自责与焦虑就不自觉地产生了。受鸦片战争的影响,清朝的政治与经济逐步衰弱,偏远的贵州也受到冲击,郑珍思想上的危机感和精神上的迷茫随之增加。

在郑珍的诗文中,施吉瑞重点选取“人境类诗”与“自然类诗”进行诠释,以为郑珍活用这两类中国诗歌的传统,以

描绘彼时真实而生动的中国,并表达他触摸到的现代性。如郑珍中年时所写诗句:“败床眠白鲤,疏坞出黄橙。”(《铜仁江舟中杂诗六首》)“延江万丈底,死绿凝一线。仄行酸腿酥,俯睨刚胆战。顾后瞻幸过,惊前呀猝转。”(《南渡河》)已非从前一味欣赏与赞美自然,而是把大自然的恐怖、衰败与超然之美混杂而呈现出来。为此,郑珍在晚年从自然山水的写作退缩回山水画的题咏上,在他为沈周、仇英等人画作的题诗里,对自然的陶醉似乎转瞬即逝,一如他自己所言:“此境人间本无主,谁其寄之即暂据。”施吉瑞认为:“郑珍中青年时代对自然的光明面和阴暗面独具一格的探索,令他能将中国自然诗现代化,从而为我们描绘出他所生活的那个可怕的新时代难以混灭的景象,而他晚年从对真实的自然的欣赏退缩回对山水画的陶醉这一事实,预示出后续中国文学的发展途径。”

此外,施吉瑞重点分析了郑珍的叙事诗,认为此类诗歌为中国留下了最感人与真实的晚清写照,并指出郑珍及其同代诗人将古代长篇叙事诗的技巧推向巅峰。提供郑珍诗歌现代性的例证还在于郑珍创作了大量知识型的诗歌,表现了对数学、天花、农具、养蚕及其他科技方面知识的兴趣。

至于技法方面,郑珍等人宗法宋诗,“也是郑珍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方面”。施吉瑞认为,郑珍等 19 世纪的宋诗派诗人“学到如何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、重新与社会和朝廷的迫切需求接榫、与人分享自己在学术和思想方面的心得、在前代文人都未曾面对过的萧瑟和无望的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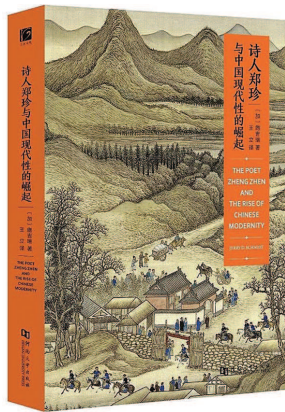
代中发现希望”。

如何定义现代性?施吉瑞未给出确切定义,但从其追溯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现代性的学者名单葛瑞汉、燕卜苏、华生、卜正民、苏文瑜等人看来,他所探讨的主要是现代性中的文艺成分。

何谓文艺的现代性?赵一凡认为“既是自由表达的欲望,也是理性自身的叛逆”(《西方文论关键词》)。江弱水在《古典诗的现代性》一书中梳理得出,六朝文学、唐诗、宋词都具有现代性。小说领域,王德威所谓晚清小说的现代性表现为颓废、有别于革新与革命的复杂心态、泛滥的情感与理性冲突及对谑仿的偏爱,这些要素与施吉瑞所谓晚清宋诗派诗人的现代性特征有某些重合处,但差异也相当明显。施吉瑞归纳的女性主义、种族平等及热爱科技等特征,可能来自更为宽泛的现代性定义。

值得思考的是,郑珍等晚清诗人流露的现代性特征与唐宋诗人甚至六朝文人的“现代”特征有何本质区别?不可否认,在郑珍等人的一些诗作中,具备了“现代感觉”,且刻意突出时代特征。郑珍云“言必是我言,字是古人字”,个体心声而不泥古的心态呼之欲出。

郑珍诗歌中,对女性的同情与关注、对秧马等农业科技的关注、强调个性和理性主义等,在前代诗歌中并不鲜见,如果这些都能称为现代性,则中国现代性的源头可能大幅提前。然而,这些文人所普遍具备的思想能称为“现代性”?由此,如何在时间坐标上整体看待晚清诗歌也成一大问题:晚清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结束,还是中国现代诗歌艰难的



《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》
王立译
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初阶?将其看作古典时代的终结,意味着其中实际并不具备特殊的现代性资源;将其当作现代性诗歌的开端,则可能面临后继无人的批评——毕竟,新诗与古典诗歌在体式上差距甚大,而民国以后的古典诗歌尽管数量惊人,但很难说与中国的现代化同调。

从晚清诗歌中探寻中国现代性如何崛起,是有趣的研究尝试。一些迹象表明,这种研究思路可能受西方历史学界“去中心化”思潮及“文化多元”理念的影响,具体而言则是“在中国发现历史”或“中国中心观”的推动。艾尔曼《从理学到朴学: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》和《经学、政治和宗族: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》及布朗《娱乐:从艺术、古董主义到中国现代史学》等著作,也试图从学术史、思想史及传统金石学的转型中解释清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,其中都暗含中国现代性起源于本土的思维底色。

在整个晚清,郑珍的实际影响仍稍显局部,这与他生活于西南一隅、并未大量接触西方有关。欲从晚清诗歌中寻求中国现代性崛起的源流,陈三立、郑孝胥、易顺鼎等宋诗派诗人可能是更好的选择。至于诗歌的地域,也应移到中西交锋激烈的东南地区。听闻施吉瑞已将研究视野转向晚近上海地区的诗歌,这可能为诗歌与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带来更有价值的成果。